

现代与传统丛书

比照与透析

中西伦理学的现代视野

万俊人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与传统丛书

比照与透析

中西伦理学的现代视野

万俊人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廖国伟
责任编辑：余小华
封面设计：张永齐
责任技编：黎碧霞

比照与透析

——中西伦理学的现代视野

万俊人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佛陶印刷厂印刷

(厂址：佛山市石湾忠信路9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1插图 40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30册

ISBN 7-218-02839-X/B·70

定价：2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万俊人，1958年7月1日生于湖南岳阳。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1986年获北京大学伦理学硕士学位。随后留校执教，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同年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起为博士生导师。1993-1994年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兼美国名人传记研究院学术顾问、《孔子研究》学术编委、湖南人民出版社“学术思辨随笔丛书”主编。迄今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代表作有：《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等六部，译著有《政治自由主义》等8种。

现代与传统丛书序

袁伟时

这套丛书收录的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决定取舍的首要条件在于是否真正的学术著作。人类是随着知识和文化的积累和提高而成长的，钟爱学术就是珍视人类的未来，戕害学术，以伪乱真，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卑劣伤害。

思想闪光，学术真知，源于自由心灵的翱翔和碰撞。千年一贯，亿万同音，调同腔同，创新生机消磨殆尽，这类中世纪的遗毒应该连根铲除。现代社会是以思想和学术自由为标志的。进入我们这个园地，相应地有个严肃的规矩：珍视自己的脑袋，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艰苦跋涉。真正的学术著作是联结已知与未知世界的形质各异的铺路石。从小小的单篇论述到长篇巨著，都应在人类文化积累的永无止境的征途中留下自己大小不等的印记。一个学者如果经受不住心灵的孤寂和思考的痛苦，不能坦然对待飞来的横逆和尘世的喧嚣，而冀图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多半是一枕黄粱。他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不过是发现和创新的喜悦与傲骨的增长，以及来自读者的真诚理解。这套丛书就是为分享这些探索者的甘苦而存在的。

世界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当代牵动世界的大事莫过于占

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在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后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是本丛书优先关注的课题。

这套丛书出版之初，曾获霍英东基金会慷慨支持。当时有关人士说了一句话：“你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我一再思考着这句话，企盼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秉着这个宗旨携手共进。

1995年春于广州中山大学

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代自序）

—

20 世纪的多幕剧快要落幕了。值此时刻，人们对这世纪的多幕剧似乎该有所反应：无论是为其悲剧潸然落泪；还是为其喜剧开心欢呼；抑或是为其平凡的一幕作礼节性的呼应。总之，在这世纪末的非常时刻，人们绝不会也不应该无动于衷。北大的百年庆典似乎是 20 世纪中国的一个注脚，这注脚的中心所指自然是思想与文化。恰巧“五·四”（也是北大校庆日）前夕，河南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回眸〈新青年〉》，并在北大农园举行出版发布会暨向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赠书仪式。在这个会上，姗姗迟到的我却急匆匆地发了一通感叹，由《回眸〈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引伸到近几年类似形式的编作出版行为，甚至联系到近年来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同类现象，诸如，历史小说、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电视改编等系列性社会文化动作，最后冒昧地将此类文化现象概括为“文化传统系谱”或对文化传统谱系的重叙。会后细想，又觉不妥。《新青年》原本是 20 世纪中国革新旧文化、传扬新文化新思想的前沿和先锋，如今怎么变成了文化传统系谱的对象呢？再往深处斟酌，又似无不妥。按希尔斯教授在其《论传统》一书的说法，能够绵延三代或三代以上者即可视之为传统，对于当代人来说，《新青年》既是一阵“远去了”的思想号角，也是一项仍在继续却“尚未完成的启蒙谋划”，自然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文化传统了。无奈，这种解释仍然没有能够脱出“既

如此，又那般”之两面性解释的圆滑圈套。我发现，陷入这种新旧嬗变不定的逻辑与矛盾性解释的，似乎不只是我一人，绝大部分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人及其文章大都不知不觉地落入了这一俗套，总免不了把新文化与旧传统、新思想与旧文化硬扯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

乍看起来，问题确乎有些匪夷所思。可认真思考一下却又不难理解。千头万绪，到底还是纠缠在现代与传统或思想与文化这种两分性的主题冲突上。20 世纪的中国文化讨论涉猎了数不清的课题，比如说，“体”“用”之争啦；中西之争啦；“问题”“主义”之争啦；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争啦；科玄之争啦；等等，等等。若想深究下去，多半只会困于“道不清理还乱”的窘境。但如果人们真的铁了心硬着头要寻绎个究竟，贯穿所有这些课题或者说始终揪住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化讨论的一条主线，恐怕也只有现代思想与传统文化这一对有些普遍解释力的大概念了。

静心细想一下，这一条两分性的文化主线的确始终是由两股拧着劲、绷着弦的话语线索纠结而成的，它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文化演进的内在紧张或张力。事实上，早在上一世纪末叶发生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这些重大社会行为中，这一拧得紧紧的线索便已经依稀可辨。“洋务运动”中出现的“保本”与“变用”的矛盾心态；“戊戌变法”中提出的“改制”、“冲决”与“守道”、“持宗”的两极对峙；实际是现代与传统或现代思想与传统文化之两分冲突的先期征兆。等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一冲突性主线就十分清晰了。有意思的是，这一冲突性主线或主题性冲突竟然一直延续到今天，依旧未见丝毫化解的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们曾经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之剑也许真的杀死了作为传统文化神圣影像的孔子，如同“新生活”的剪刀真的剪断了

国人头上的长辫，“新文化”的语言声浪真的盖过了念念有词的八股文章，但是否可以由此推出，新文化新思想的利剑一定就杀死了作为中国文化精神化身的孔子？这似乎还是一个疑问。至少，当我们走出城市或书斋，回到乡下看望父老乡亲，些微了解一下他们的日常人伦人情时，这疑问仍然是不容易摆脱的。

即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演示了一出以“先进的革命思想”来横扫传统旧文化的闹剧，甚至强行发动了一场“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思想改造运动”，这种简单粗暴的“思想革命”也并没有真的“革”掉传统文化的“命根”，亦未能真正革新人的“灵魂”。相反，虚假理想与狂热激情的最终幻灭，给社会和人们的思想灵魂留下了几乎是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导致了更为强烈的文化反应。70年代末拨乱反正之后，随着“左”的思潮的退却，社会文化思想界突然出现了一段空白。正是这种特殊状况，使得随后西方各种新潮的迅速涌入成为了一种文化事实。“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存在主义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仿佛我们的思想观念早已经与国际“接轨”了。进至80年代中后期，从西方新潮反反复复的冲击热乎中冷静下来的人们，突然又掉转船头，拼命地划回自己的文化驻地，一时间又仿佛真的出现了所谓“传统文化热”。这种在中与西或新与旧之两壁构成的峡谷间左奔右突的景象，又一次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了现代与传统或现代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是多么强劲，强劲得足以使那些文化神经不够坚强的人头昏眼花，产生一种真正绝对的文化眩晕。

二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确定，20世纪的主题冲突是否会

延伸到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连续起伏的世纪性文化论争主题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了 20 世纪中国的一个心结。作为 80 年代初才以伦理学初学者姿态涉足哲学和伦理学论坛的年轻学人（就思想与文化来说，“年轻”一词在积极的意义上意味着“单纯”，而在消极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幼稚”），我最初乃至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以西学新潮的追逐者身份和心态来加入学术论坛的，如同当时的绝大多数年轻学人一样。

我的出发地是 80 年代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更具体地讲，是当时最富于自由思想刺激和人学革命激情的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因此，我写出了“康德与萨特主体伦理思想比较”（发表时，我不得不接受编辑的建议，删除了标题中容易引起某种误解的“自由”二字）和“萨特人学与马克思主义”两篇长文。它们虽是我撰写学位论文的副产品，实际却比我稍后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扩充出版的有关萨特伦理思想的专著更有影响。随着我留北大任教的职业定位和当时研究方向的择定，我差不多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现代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之中。这使我对现代西方前沿性伦理思潮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也有了些微“历史的眼光”。于是，我把教研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的课题上：一是系统梳理 20 世纪西方伦理思潮的流变脉络，以求获取一种较为完整的西方现代伦理学图景；二是努力追寻西方现代伦理学的前沿进展，以捕捉最新的思想焦点和学术信息。后一方面随着我 1993 年的哈佛访学之行而一直持续到今天。透过有关罗尔斯、诺齐克正义伦理学理论的个案研究论文，和几篇关于现代西方伦理学演变趋势的总体性研究文章，读者不难发现我个人的学术用力所在和思想心迹。

然而，让我日益不安的是，我愈是追寻西方伦理学新潮的前

沿信息和思想观念，一种孤身突入陌生世界的学术孤独感和文化恐惧感便愈发强烈。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驾着一叶扁舟飘荡在远离海岸的文化漂泊者，或是像一名异域文化世界的闯入者甚或盗窃者；或是像一位突前狂奔一阵后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文化流浪儿。离家太远，感觉不再只是勇敢闯入者的豪迈，更多的是“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的思乡愁绪。

事实上，90年代前夕，我对于自己的文化飘荡和思想追逐所带来的文化焦虑已经有所察觉。因此有意识地强迫自己折返文化“老家”，开始重读中学的典籍文本，甚至还写出了好几篇有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和人文精神的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这部文集下篇的基本内容。然而，由西返中并没有使我摆脱现代与传统、西与中、现代思想与文化传统……的矛盾纠结。在这种心理重负之下，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思想前沿与文化传统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在先进的现代思想与历史的文化传统之间怎样才能保持一种恰当的“对接”和平衡——如果这种“对接”和平衡是对两者间基本关系的合理理解的话？很显然，这个问题所触及的已经不只是我个人的学术专业或思想检讨了，毋宁说，它也是我们当前所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普遍性文化课题。

三

所谓思想的前沿，当然是指学术思想的现代性和先进性，它是学者或思想者对当代国际性的思想主题、信息和最新趋势的追踪与反应。保持思想的前沿性需要有相应的追踪和反应能力，包括知识结构、思想方法、概念理解、话语方式或参与先进思想交锋的对话能力，等等。前沿的并不一定都是先进的，更不一定都能得到合理正当性的证明和历史的验证。但也不能因此而把前沿

性的思想或观念看成某种短命的文化时尚。一种思想新潮或观念的产生与流布，本身不单需要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而且也反映着思想者或理论家对人类社会文明或文化的最新思考，蕴涵着某些合理的文化解释和预期。所以，追踪思想前沿是一个成熟而有能力的学者或思想者所必需的功夫。惟其如此，他或她才能保持一种开放的学术胸襟和世界性眼光（杜维明先生谓之“世界性视景”），才能使自己的学术和思想获得新鲜的智力资源和精神动力。

由此，我想到一个学术问题：近些年来，在一些学术文章或著书中，出现了不少新的知识结构、新的学理方法和新的理论概念、术语和语词，许多人对此颇有微词，轻者以“看不懂”或“听之任之”来言之论之；重者则以“摆谱”或“故弄玄乎”加以责叱批评。这里面，显然有学术代际的隔膜与误解因素；也确有故意让人看不懂的“摆谱”或“故弄玄乎”行为。对后者，我当然赞同予以责叱和批评。但在我看来，绝大多数情形并非如此。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尤其是在一个后起的、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学术耽误”（对于一代或几代学人来说）和“学术隔离”（对于整个现代中国学者来说）的现代化国度，出现这样的学术上的隔膜或误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种隔膜或误解不应超出学术知识的范围，更不应左右学人的学术姿态，造成正常学术交往的障碍，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学术鸿沟。在这里，最需要的仍然是学术宽容，不仅是对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宽容，而且还有对那些具有新知识结构和新思想训练的新学人的宽容。与之相应的则是相互理解，不单是老传统对新思想的理解，也有新思想对老传统的理解。事实上，没有创新的文化传统，不可能成为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反过来，没有传统文化资源的思想创新，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有文化价值的思想创造。

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学术思想的文化基础和传

统资源方面。作为一个从现代西方学术出发的青年学人，我的经验肯定是单方面的、有局限性的。但我的教训，比如说，我所感受到的文化孤独和学术忧虑，或许不乏某种程度的普遍意义。中学与西学和传统与现代这两对矛盾常常是难以分开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1）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西学本身就具有一种历史赋予的现代知识的特性和思想启蒙意义，它表征着先进文明的文化成果和思想境界。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国学者在本世纪就曾经先后认同过许多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诸如，自由主义；社会进化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我们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也是基于一种对科学的新思想或新观念的追求与信仰而进行的。（2）我们的“中学”概念总具有某种封闭的历史意味，也就是说，它总是与某种“传统的”、“古典的”、“历史的”或“过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缺乏一种开放的、流动的、连贯的文化理解。实际上，所谓“传统”，并不能作静态的文本解释。依希尔斯教授的“传统”观来看，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内含着不断创新与不间断的继承之连贯性文化进展过程。否则我们就不应当将之称作为“传统”，而只能称作“遗迹”。“传统”（traditum）的本义原指某种既有所积累或保留、也有所流失或抛弃的连续传承系统。严格地说，虽然“传统”与“现代”具有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但并不构成一种文化价值的对应关系，而是处于同一变动系列中的不同状态。“现代”的也可能成为“传统”的，而已经成为传统的东西，不过只是过去了的“现代”的沉积而已。从思想的意义讲，“现代”当然不同于“传统”。“传统”是业已理论化的思想，而“现代”则更多的指一种具有现时意义的开放着的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更多的是指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或“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才疑惑“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先进们所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否具有文化精神的真实性。

四

上述思考使我对思想与文化或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这样的理解：即，思想总是具有现代意识和观念创造的，它是思想着的思想者的思想，因而也总是思想者带有前沿意识的观念行为。但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思想，都不会是凭空而生的，它需要文化传统的支撑，需要思想的资源，而这一切都只能从已有的文化或理论成果中去开掘、去发现。否则，所谓思想，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或子虚乌有。同样，文化的生成与生长必定有赖于特定传统的形成，有赖于其自身的绵延或连贯性发展。一旦失去这种连贯性的绵延发展，某种文化乃至该文化所依附的文明也必定会寿终正寝，从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上消失。历史上的巴比伦文化大抵可以作为一个显证。

由此可说，前沿性的思想若要免于枯竭或幻化的结局，必须有巩固的文化后方，也就是要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和传统维系。如此，思想本身才有可能开花结果，才能融入文化传统的生命之流，并最终获得一种传统的文化力量。我这样说，当然不是看轻思想创造或理论创新的价值。相反，我一直坚信，惟有充满并能长久保持思想创造精神的文化传统，才能够成为真正富有活力的文化传统。因此，我把思想创造与传统资源看作是文化绵延发展的两种不尽相同却又相辅相成的生长点或原动力。这样，我们就不会割裂思想与文化或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联系，造成两极化对立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理解。

这样一种连续性或连贯性的文化概念必定也是开放的和流动

的。在这样的文化概念里，思想与文化或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接实际上也就成为了不同环节之间的连接。然则，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思想与文化或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平衡看作是一种系统内部具有稳定特征的结构性平衡。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要保持其生长的活力或文化生命，就不能缺少思想创造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张力。正是这一张力，促成了文化自身的发展，不断改变着文化系统的固有结构，不断积累文化自身的资源。事实上，这种内部的张力或紧张是不可根除的，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特殊时期，它甚至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破坏性。在现代社会情形下，思想的创造具有某种优先意义，这是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竞争特点所要求的。多元文化的竞争本身不只是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的竞争，而且更是一种思想创造力量的对比。

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具有自我修正、自我更新和自我创造的潜能。然而，仅仅凭借传统文化本身的内在资源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吸取异域文化或文化他者的智力资源和价值资源，学会在相互遭际和交往中吸收文化他者的优秀成果，在竞争中学习，在学习中竞争，非如此不足以强健自己，发展自己。在某特定时期，了解或学习文化他者的思想与传统，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更新，也常常成为思想创造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这种了解或学习不能是简单的移植或挪用。“拿来主义”最多只能算是某种消极的权宜之计，决不能作为长远的文化策略。我迄今为止的学术工作也许并未达到与我的认识同步的境界，而且我目前的这种观念也未尝确切。进入一种新的学术境界需要时间，更需要努力。我自觉作出了某种努力，至少，近十余年的学术劳作使我在领略某些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明白了自己的文化后方和文化后方之于思想创造的重要性，有了这种体会，或许我有理由对自己今后更进一步的学术探究寄予某种新的期许。

目 录

现代与传统丛书序	袁伟时 1
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 (代自序)	1

上编 西方伦理学的现代视景

一 康德与萨特主体伦理思想比较	3
(一) 自由: 主体伦理学的共同基点	4
(二) 目的与关系: 主体伦理学的不同确证	12
(三) 方法与结论: 主体伦理学的不同归宿	23
二 萨特人学与马克思主义	31
(一) 人学三步: 本体论·转折·历史人学	31
(二) 历史人学: 缘起·方法·结构	40
(三) 萨特人学与马克思主义: 几点结论	54
三 诺齐克人权理论摄义	64
(一) 人权与“最低限度国家”	65
(二) 补偿原则: 行动及其禁止	73
(三) 资格理论: 财产占有的三个原则	76
(四) 两种原则: 罗尔斯正义论批判	80
(五) 正义与人权: 两种模式的比较和远景	85
四 关于美德伦理的传统叙述、重述和辩述	92
(一) 美德与规则: 《美德的追寻》	93
(二) 美德伦理传统的历史叙述与选择: 《谁之正义? 何种合理性?》	102

五 正义理念的伦理表达与政治建构	116
(一) 引言	116
(二) 正义论伦理理念的基本表达及其问题	119
(三) 回应挑战: 政治自由主义建构	134
(四) 进退之间: 罗尔斯新自由主义的初步估价	150
六 政治自由主义的现代建构	158
(一) 源与缘: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	158
(二) 前提预定: 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169
(三) 理念扩张: 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理念”	181
(四) 制度框架: 政治自由主义的社会图式	208
(五) 进与退: 政治自由主义的限度	217
七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勃兴与承诺	234
(一) 演进与承诺	234
(二) 前景与启示	243
八 当代西方伦理学的主题嬗变与传统回归	249
(一) 泛化与元化的现代两极预制	250
(二) 多元与同向的当代主题回归	259
(三) 结束语: 未来的理路与挑战	271
九 美国社会伦理学的新发展	277
(一) 理论展开	277
(二) 问题与启示	291
十 试析现代西方伦理思潮对我国青年道德观念的冲击	305
(一) 现象种种	306
(二) 理论背景	309
(三) 初步的解释	314
(四) 后果与回应	322